

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

唐世平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的安全考虑作了一个确定的解读。首先,作者对中国的安全行为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然后对中国目前安全战略的本质作一个概括;文章重点探讨了中国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以及中国对地区和世界安全事务的基本思想,并讨论了世界对中国应该或不应该期望些什么。最后,文章还讨论了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演变。

关键词:中国 安全 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唐世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兼安全与外交室主任。(邮政编码:100007)

一、问题的由来

自1840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寻求安全,或者说是西方式的国际政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学习过程。但是,经过160多年的学习,中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连贯的安全战略,至少在概念层面上是如此。

但是,观察家们对中国安全战略的认识及其未来趋势的判断却多少有些混乱。这方面,美国国内有关对中国是要“接触”还是要“遏制”的论战是最好的例子。^① 对遏制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企图推翻目前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遏制是惟一可行的选择。相反,接触战略的提倡者认为,中国一直在试图与世界和平共处,因此,接触能够让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而遏制则可能导致一个本不会成为敌人的中国最终成为敌人。在两个流派之间,还存在着“遏制+接触”流派所提倡的混合战略。^②

这些对中国安全战略的认识及其未来趋势的判断的分歧除了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安全信念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人们理论思维上的混乱。首先,许多观察家给中国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因而暗示中国是一个扩张和顽固的国家),却忘记了说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更糟糕的是,许多分析家不区分进攻性和防御性的现实主义,而把现实主义等同于强硬派或修正主义

^① 有关这场辩论的理论和历史分析,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31.

^② Zalmay Khalilzad, “Congage China,” RAND Issue Paper No. 187 (1999), available on web at: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IP/IP187/IP187.html>

政策。这样的分析显然不能理解中国现实主义的防御性本质。^①

其次,关于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也失之偏颇。^②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考虑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该融入国际社会,而是中国在多大程度和以多快的速度融入国际社会。因此,这一问题应该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计划是有限制的还是无限制的?中国一直在追求国家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因为中国并不想推翻地区或国际秩序。不幸的是,没有评论家愿意阐明这一并不细微的区别。

更糟的是,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使得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可以找到一个否认中国追求统一只是在追求其最根本的合法利益的借口,并因此而拒绝考虑统一后的中国可能是这一地区的伙伴,而分裂的中国将永远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世界在 21 世纪的挑战之一就是该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的话,那么,理解中国安全战略的本质对于外部世界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理解中国安全战略的本质,其他国家才有可能制定一个合理和可行的对华政策。也只有这样,世界和中国的 21 世纪才会更加美好。

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的安全考虑作一个更确定的解读。首先,我将对中国的安全行为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然后对中国目前安全战略的本质作一个概括,接下来,我将重点探讨中国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以及中国对地区和世界安全事务的基本思想,并讨论世界对中国应该或不应该期望些什么。最后,我将讨论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演变。

二、中国的安全行为:历史的回顾

按照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大概有四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来获得安全:武力、联盟(集体防御)、安全合作^③,以及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总体说来,进攻性现实主义仅仅相信武力与联盟;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除了武力与联盟之外,安全合作也能够带来安全。新自由主义则强调除了武力、联盟、安全合作之外,多边安全组织也能够带来安全。^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运用了上述所有的四种方式寻求安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四种方式的侧重程度又有所不同。

集体防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中国先是和前苏联结成了紧密的同盟,而后与巴基斯坦、美国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但到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就基本上放弃了联盟(至少是紧密的联盟)作为其寻求安全的方式。

因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安全组织——联合国,在 1971 年以前基本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和惩罚中国的工具,因此,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对多边国际组织持怀疑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体安全是在

^① 例如,两个著名的年轻中国问题专家 Christensen 和 Johnston 曾把中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看作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顽固性、进攻性),参见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5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David Shambaugh,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Vol. 43, No. 3 (Autumn 2001), pp. 25~30.

^③ 中国政府一般用“安全合作”,而不用“合作安全”。作者个人的理解是“合作安全”包含更加严格的互信措施。中国并不排除“合作安全”的可能性,但为了谨慎起见,一般只提“安全合作”。本文也采用“安全合作”,因为它更加符合“防御性现实主义”。

^④ 有关三种主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比较,请参阅文后表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在中国的安全政策中有了一席之地,但它的地位显然在不断上升。^① 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风波后中国的外交孤立可能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家和政策制定机构获得了中国融入世界的知识、经验和利益。^②

相比之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的安全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安全政策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运用它处理了与其邻国,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边界争端。冷战后,中国又基本上完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越南(仅指陆地和北部湾)的边界划分,和印度之间则建立了建立信任机制。

纵观历史,在总体的安全政策上,按照国际政治理论的界定,新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③ 第一时期是1945~1985年,在这一时期,集体防御与安全合作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第二个时期是1985~1989之间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价趋向乐观,^④ 中国基本上放弃了明确的集体防御,而更强调安全合作和松散的集体防御。采取这种方法使中国得以保持一种更独立和灵活的安全政策。

1989年,冷战开始终结。这使得联合国这一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合法、最权威的多边国际组织,终于能够开始部分地履行其神圣使命。因而,中国开始逐渐对全球和地区多边安全组织、机制(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和行动(在柬埔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坚持其安全战略中安全合作的核心的同时,开始接受集体安全的观念。

三、中国安全行为的理念基础

历史仍在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安全思想。自从1840年以来,每一代的中国人都在始终如一地追求同一个目标:一个富强且被外部世界所尊敬的中国。这一点显然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的。

除此之外,三个基本的理念支撑着中国目前的安全战略。这其中有两个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确立;另一个在邓小平时代已经初露端倪,但在江泽民时代才得到充分发展。

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70年代末,在访问了几个东南亚国家并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都对中国抱有疑虑后,邓小平意识到尽管中国不断强调其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意愿,但中国早期的政策(如输出革命、不愿意解决华侨问题等)已经使得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疑虑。由此,邓小平意识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并非纯粹是其他国家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和中国本身的发展和政策密切相关。

邓小平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他事实上等于承认了“安全困境”的存在。自那以后,这一意识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战略思想和行为。

^① 关于中国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参与,请参阅:Alastair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pp. 235~272.

^② 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ARF对中国安全思想和各部门体制的影响的评论,参见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View from Beijing,” *Survival*, Vol. 42, No. 3 (Autumn 2000), pp. 41~59;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l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XXXVIII, No. 5 (May 1998), pp. 425~440.

^③ 不同的学者纯粹根据中国政策的大转变(比如“亲苏”还是“亲美”)将新中国的安全政策演变分为四个阶段,但具体的分界点又有所不同。比如:Wu Baiyi, “The Chinese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7 (May 2001), pp. 275~283;叶晖南:“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战略的四次大调整”,《新华文摘》,1999年第10期,第65~67页。

^④ 邓小平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9页。

支撑中国安全战略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自我约束”。这一点体现在邓小平著名的“韬光养晦”训导中。在1990—1992年间的大量演讲中，邓小平反复告诫他的后继者不要在国际事务中追求领导地位和承担中国不能承担的责任。^①

支撑中国安全战略的第三个基本理念是在邓小平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以江泽民为首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发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和实行“自我约束”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标志，而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解了支撑中国安全战略的这三个基本理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安全行为。

四、中国的安全行为

和支撑中国安全战略的三个基本理念紧密相连，如今中国的安全行为也是持续和连贯的。其中有四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之一，因此，中国一直在努力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基本政策尽管在1995/6年的台海危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一系列事件后面临民意的压力也仍在继续。

其次，因为中美关系始终会存在起伏，中国意识到必须维持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才能抵御中美关系恶化时的安全压力。与意识到安全困境的存在紧密相联，中国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通过与其邻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塑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在—个有15个邻国的地理环境中，中国认识到不论中国有多强大，进攻性的安全政策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将很有可能导致邻国和位置较远的大国（最可能是美国）联合起来围堵中国。但是，如果中国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努力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其他国家就不大可能采取“硬性”的遏制战略，中国就可能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并且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与几乎所有邻国的关系。中国已经解决了许多可以解决的领土争端，而将一些难以解决的争端搁置起来。中国在与日本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克制，^②在南中国海，中国也没有夺取它完全有能力夺取的更多的海岛。在中印之间，中国在坚定地执行与印度达成的全面建立信任措施。

再者，因为中国已经部分接受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理念，因此，中国已经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或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和组织。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态度从迟疑变成了积极支持。与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一起，中国已经把或多或少是双边的“上海五国”塑造成了一个多边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同时，中国积极参加地区多边安全行动，如联合国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的维和行动。虽然中国接受多边主义是一个逐步的、不完全的过程，但这一趋势是清晰无误的。^③

不过，中国清楚，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有所不同（经济领域的合作通常要比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加容易，风

^① 许多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等同于“卧薪尝胆”，即等待时机，当中国足够强大时再报复。但“韬光养晦”显然完全不同于“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仅指保持低调。

^② James Miles, “Chinese Nationalism,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42, No. 4 (Winter 2000/2001), pp. 51~72.

^③ 例如，1995年大部分中国分析家都怀疑联合国维和行动会被西方国家所利用。参见黄仁伟：“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及其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学术季刊》，1995年第4期，第66~74页；唐天利：“维和行动需要走出误区”，《瞭望周刊》，1995年第17期，第57页。但是到了2001年，许多分析家已经开始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参见唐永胜：“联合国维和行动变革及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65~70页。

险也更小),因此,中国对多边经济合作组织的态度更加积极。^①而中国安全思想中“韬光养晦”和谨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决定了中国对集体安全的态度仍将是谨慎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信心,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官员在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安全组织和机制。因此,中国融入多边安全机制和组织的政策将继续下去。

总结起来,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主导中国的安全理念和行为。^②

五、中国安全战略的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目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加谨慎的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理念和行为将会继续,但相互关联的两个外部因素和两大国内辩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

(一)美国的战略意图

第一个外部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因为中国把美国放在其安全政策制定的中心,美国正在做的、计划要做的,甚至传说中要做的举动,都将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杰维斯(Jervis)所言:“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的声音既响亮又清晰,能影响其它国家对现实的判断。”^③

最近两个重要的发展,即美国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系统和执意要部署 NMD 系统,已经开始动摇中国目前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

虽然联盟是寻求安全的合法方式,但在没有具体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强化以自己为中心的联盟,并且将更多的武力投放到亚太地区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人士认定美国的意图是敌视中国。^④

同样地,美国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导弹威胁,而且国际社会也有其他的方式来抑制潜在的威胁,因此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事实上并不必要。这样一来,大部分中国分析家都认定: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拥有威胁对中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利益的自由。

这两个发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因为他们威胁到中国自 1985 年以来对其安全环境的乐观估计。^⑤没有对安全环境相对乐观的估计,中国目前的安全战略将难以持续下去。

(二)地区信任问题

第二个外部因素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国持久的不信任。

在 90 年代早期,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后,一些评论家如克劳特海默(Krauthammer) 和已故的

^① 中国在多边经济组织中的参与,参见 Margaret M. Pearson,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pp. 207~234.

^② 类似的结论,也请参见楚树龙:“后冷战时代中国安全思考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第 10 期,第 11~15 页;吴鹏:“中国的亚太安全观及其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5 期,第 12~16 页。

^③ Robert Jervis, *The Symbolic Nature of Nuclear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 4.

^④ 中国对美国联盟政策的批评部分也归因于中国已经不再追求任何紧密的联盟,因此,它也期望别的国家也这么做。中国不再以任何一个国家为特定的敌人。

^⑤ 最近对中国安全环境相对悲观的估计,参见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第 2 期,第 5~10 页;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1 期,第 20~30 页。

西格尔(Segal)推出的“中国威胁论”在亚洲获得了广泛的追随者。^①但是,关于中国由于石油需求而向南中国海进军的画面至今没有变成现实。虽然人们可以说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其他限制力量抑制了中国采取扩张主义行动,但是人们同样应该考虑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中国也许根本就没有针对其邻国的野心。而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和它的邻国共处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人们也许会认为当其他国家审视中国所做的一切后,许多国家会意识到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国家仍然以深刻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一些国家始终怀疑中国仅仅是在等待时机,而当时机成熟时,就会将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纳入囊中。大多数地区观察家认为,中国不可能是“一个善意的大国”(a benign great power)。

中国理解本地区的国家有理由对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感到忧虑,并要求中国自我约束。中国不理解的是,地区国家对其他大国(如美、日)的善意似乎毫不怀疑;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和日本对本地区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中国。

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依然在遭受自1840年以来的不平等待遇。中国的“受害者综合症”仍在继续,只是换了一幅新面孔。许多中国人对中国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感到不知所措:当中国虚弱时,别国蹂躏他、欺辱他;而当他逐渐强盛起来时,别国又感到害怕。中国似乎永远不能从国际社会中得到任何“赞赏”。

这种对中国善意的持续的怀疑正在危及中国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疑虑是因为学术的惯性,还是因为指责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关键在于这种对中国意图持续的怀疑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的精英们对中国目前安全理念的心理支持。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家都相信:绝大多数国家中“中国威胁论”的毒已深,几乎无可救药。因此,中国不可能让他们相信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大国。这样一来,中国根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安抚他们。相反,在整个地区经济困难而中国仍然保持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获得利益。因为无论中国做什么,没有一个国家会喜欢中国。

令人悲哀的是,外部世界不仅不愿去试图理解这种心理伤害所造成的影响,而是不以为然甚至嘲弄。这样只能加速恶性循环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中国最终有可能失去做一个“好国家”的耐心和渴望。

(三)“和平与发展”的辩论

与两个外部因素密切相联,中国国内的两个辩论也将深刻地塑造中国未来的安全战略。

首先,1999年中国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重新燃起了有关“和平与发展”的辩论。^②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关于中国处于一个或多或少相对宽松的安全环境的评价是否正确?换言之,中国希望了解它所面临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场辩论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外部世界(主要是美国和地区国家)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友好的还是根本上敌视中国?人类历史真的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是仅仅出于中国的想象?

回答这两个问题取决于我上面提到的两个外部因素。事实上,为了使中国维持目前的安全战略,美国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必须向中国传达令中国放心的信号(reassuring signal)。不幸的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形势已经不乐观。

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政府是一批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想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制约。另一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p. 72;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7~135.

^② 《世界经济与政治》为此特编辑了两期期刊,2000年第15、16期;张睿壮:“重新评估中国的国际环境”;时殷弘:“正确评价世界秩序及其发展趋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103~105页。

方面,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的巨大反差,地区国家认为中国正在引起另一轮金融危机。^①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国人叩心自问:是否这个世界对中国根本就不友好?

(四)责任与负责任的国家

第二个辩论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如何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②更确切地说,中国是应该主动去承担责任?还是限制其义务?

在这场辩论中,一派意见认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这是因为如果中国不这样做,其他国家就会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私的国家,不利于中国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积极地寻求责任是不明智的。这是因为,中国不仅缺乏承担过多责任的能力,而且主动地寻求责任容易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像是一战前的德国;一个渴望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的国家。因此,为了避免被认为是一个有野心的国家,中国应该仅仅承担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而且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的责任,而不应该去主动地寻求责任。毕竟,一个国家被认为是自私的比被认为是野心勃勃的要好,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自私的。

这一派的人士进一步认为,正如美国从越南吸取了教训一样,中国也应从它过去曾轻率地卷入远离中国大陆的地区事务(阿尔巴尼亚、非洲等)的那段经历得到深刻的教训。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危险并不是做得太少,而是做得太多。

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似乎第二流派占了上风。因此,世界也许不应担心中国做得太多。实际上,中国可能做得比国际社会要求或期望的还要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忽视他的利益或推卸国际社会所要求中国承担而且中国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在所谓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人类安全(包括他的海外公民)、反恐怖主义、反毒品走私等等,人们可以期望中国将积极与其他国家在双边与多边的框架内进行更加密切地合作。

在经济领域内,人们也可以期望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和行动。这不仅因为中国认为积极参与经济组织符合他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相信(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减少它们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旨在加强和南亚国家合作的“昆明行动”计划,以及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拓展和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从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结语:展望未来

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即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安全思想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上升,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要继续下去将面临同时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

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国家的一些人士已经将中国视为其必然的主要敌人,因此无论中国如何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良好愿望,他们都将采取对中国不利的策略。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不能用一个平静的心态来对待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些国家因为中国的版图太大,或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就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他们意识不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中国只是一个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试图捍

^① 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Growth Weigh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18, 2001; Kenichi Omahe, "Asia's Next Crisis: Made in China," *Strait Times* (Singapore), August 2, 2001.

^② 这方面的讨论,参见王逸舟:“发展、主权与责任:三大任务”,《世界知识》,2001年第5期,第8~10页。

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对中国意图的深刻疑虑将使得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中国国内失去信任而不被接受,而最终危及到中国执行现行政策的耐心和决心。

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有一个更确定的解读后,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更多的信心。中国不是一个扩张性国家,也不是一个试图摧毁当今的国际秩序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试图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①因此,中国需要国际社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日益强大:学会和中国共处。中国不需要国际社会任何特殊的待遇,中国需要的仅仅是平等相待。平等将使中国和世界建立更多的相互尊敬和信任,从而使中国能更好地和世界共处。

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在未来面临的来自中国国内的压力主要将会是中国日益强大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除了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像《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大众民族主义之外,还可以表现为中国有可能会追求在一些中国并没有太多力量干预的地区或事务上的干预,或是一些领导地位。后一种形式对中国未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这一点也许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因此,中国精英们要防患于未然,致力于塑造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

表一: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概览

	进攻性现实主义 OFFENSIVE REALISM	防御性现实主义 DEFENSIVE REALISM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无政府状态是事实	是	是	是
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行为体	是唯一的	几乎是唯一的	是其中的一个,但不见得那么重要
国际政治中力量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是	是	不一定
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是	是	是
安全困境是否真实存在	否	是	是
和平的条件	霸权稳定	霸权稳定、力量平衡、安全合作	霸权稳定、力量平衡、安全合作、多边组织
其他大国的崛起是否一定导致战争?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国际组织在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无	有一点,但不多	很有用

(责任编辑:于铁军)

^① David Lampton, "A Growing China in a Shrinking World: Beijing and the Global Order," in Ezra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 Y.: W. W. Norton, 1997), p. 136; Stuart Harri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aper presented in a Trilateral Commission Special Study Group on East As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eijing, October 23~25, 1999.